

前言

1990年代，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圖書館找尋資料。東亞圖書館館藏豐富，卷帙浩繁，一本本端端正正的擱在架上，數千年文獻，任我隨意翻閱。善本珍藏、學界新作，無不教人動心。我徘徊於大小書架之際，無意中在中國語言館藏部分看到架上有一本關於粵語的老書，一時好奇心動，順手抽下。我站在昏黃的吊燈底下，打開略略翻了幾頁。這一翻閱，就讓我坐在圖書館地上看了整個下午；也就是因為這一時間無意的衝動，開拓了我這後來二三十年的研究新路向。

我不是粵人，但在香港長大。襁褓嘔啞的時候，隨家人從上海南下，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到後來上大學、研究院，前後二十二年，都在本地受教育。粵語是我的第二語言，但也是我最熟悉的語言。我1967年上研究院的時候，師從周法高先生。第一年的學期報告，他讓我研究粵語中的體貌標誌。我對這個題目，所知極有限，於是努力閱讀前人著作，搜尋語料，數月窮幹，寫成報告，戰戰兢兢地交上。周先生看了以後，大概是覺得當中有一些可取之處，於是把文章推薦給研究所，1970年刊登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這是我發表有關粵語的第一篇文章。在此同時，趙元任先生巨著*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國話的文法》）面世，周先生明睿高瞻，知道這書對當代漢語研究定必有深遠的影響。於是請到剛從美國回港的洪越碧先生負責翻譯為中文，讓我謄抄。我一字一句

謄抄之間，對趙先生的討論漸有體會。趙先生觀察入微，對話語中一句一詞的運作功能，無不條分縷析，而且在整個理論架構上，更為漢語建立全面的體系。我每天細啃趙書，孜孜不倦。周先生讓我研究粵語的體貌詞尾，我就是按照趙先生的模式，對比國語和粵語的同異，發現粵語有許多表現顯得特別異常。一年下來，周先生讓我繼續這樣的研究，對粵語作比較全面的觀察和分析，作為我的碩士論文。1969年呈交，1972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刊行。論文共六章，後來周先生再讓我補寫四章，一直藏在篋中未發，到2007年中文大學出版社重版，才增訂為十章。周先生自己不說粵語，但是在周先生的帶挈和引導下，我和粵語結下終生不解之緣。

這段因緣，在我來到美國求學幾年，卻暫且放下。我在柏克萊上研究院，隨張琨先生學習，選課的重點在現代語言理論，研究的重點在歷史語法。張先生讓我翻閱敦煌文字，專力研究中古漢語。敦煌卷子中有所謂變文的通俗作品，文白夾雜，正是當時說唱表演留下的活語料。我就按著這些千年文本中留下的痕跡，試圖擬構早期漢語語法嬗變的現象。此後多年，我在美國教學工作，語言研究還是按著這個路子進行，同時也檢閱現代漢語和各方言中各種語言現象。不過，舊愛在心頭，我偶爾又會回到粵語，重作馮婦，從語音到語法到詞彙，從共時描述到歷時分析，陸續發表了一些文章，繼續我對粵語的探討。但沒想到二十世紀末柏克萊圖書館架上的一本老書，像是一個不經心的邂逅，機緣巧合，也許是命運刻意的安排。我就在這燈火闌珊、驀然回首一刻，終於醒悟到這才是我要追求研究的真正對象。老書是明證，我的下半生就這樣交給粵語。

接著幾年，我努力蒐尋有關早期的粵語語料，白天跑圖書館，晚上埋首老粵語故紙堆中。來回翻閱之餘，有時興致突發，我會把書中的字句大聲朗讀，時光倒流，恍惚身作古人，口中說著上一個世紀的語言。我從柏克萊退休以後，回到香港工作。離鄉日久，年輕人說的畢竟是二十一世紀的粵語，我仔細觀察，也刻意模仿新派

的腔調和用詞。但另一方面，由於我對老派粵語的執著和鍾愛，在日常說話中，常常會不自覺地用上一百多年前的老腔舊話。我這種新舊合璧的語言分裂傾向，有時候會讓年青的朋友覺得奇怪，這個老先生說的到底是哪一種白話？但正因為我這個難得的機緣，可以新舊對比，更覺得老粵語內裏的變化，錯雜繁複。從前在闌珊燈火處的片刻醒悟，如今都點著了一盞盞的明燈。我不趁此機會研究，如入寶山空手回，豈不可惜？於是在隨後的十幾年中，我努力寫了一些文章，大部分都是關於早期粵語的各種語言現象，在描述同時，也試著解釋新舊交替之際所發生的種種變化軌跡，希望能從眾多的語料中，擬構早期粵語的語音和語法系統，供後來者可以參考和印證。

粵語是粵地方言。兩廣一帶，地大民眾，語言繁多。有閩粵客家等不同的漢語方言，也有遍佈各地不少的少數民族語言。語言混雜，相互影響，自不在話下。但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的特徵，清楚標誌自己的語言歸屬和身份。漢語和非漢語、粵語和其他方言之間的分別，不難辨認。閩粵客家是大方言，大方言中又有小方言，而大小也各有其界定的語言標誌。以珠江三角洲為例，廣州通行的語言和台山通行的語言都屬於粵語，但廣州的居民和台山的居民並不一定能隨意交談，他們的語言其實屬於不同的小方言片。廣州三邑等屬於所謂的粵海片，台山屬於所謂的四邑片。同屬粵海片的廣州話和中山話，口音容有差異，但並不會造成溝通障礙。所以在大的粵語統稱底下，可以細分為粵海、四邑等方言片。粵海片底下又可以細分廣州、中山、南海等小方言；四邑片包括台山、新會、開平、恩平四地方言。其他還有東莞寶安片、肇慶羅定片等等，都屬於所謂的粵語底下的方言片。

香港原屬廣東寶安縣下的一個小城鎮，1842年割讓給英國，其後新界一帶也劃作百年租借地區。接著的百多年間，在政府和社會

的共同努力之下，香港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大都市，華洋雜處，中英並行。但是當地通行的語言究竟歸屬如何？簡單地說，香港通行的語言是粵語，屬於粵海片，和廣州的粵語同源，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廣府話或廣東話。但是新界一帶，老一代還流行所謂的圍頭話和客家話等。時移世易，這些不同的方言漸漸被廣府話取代，而香港和廣州雖然相隔不遠，但各自的廣府話卻又各自發展。今日在香港粵語無論在語音、語法、詞彙上都呈現許多自己獨立的面貌。而且，香港的粵語有自己的官方和法定地位，與英語、普通話平起平坐。香港人口絕大部分是以粵語為母語，學校教學語言大都以粵語為主，社會上一切政治、商業、娛樂活動都以粵語為主要溝通語言。書寫以繁體字為主，而且以口語入文，自創許多方言文字，方便書寫。香港粵語也雜用大量的外來語，久假不歸，有的已經成了本地詞彙一部分。這種種發展，在在都可以看到香港式的粵語已經深入社會每一階層。香港是從1842年的割讓到1997年的回歸中國，前後經過一百多年來的滄桑變化，香港話已經逐漸形成自己一種語言，可以歸屬於粵海片下一個獨立的方言。

香港早期的粵語來自廣州，同源同根，自不待爭論。但從十九世紀以來，香港粵語和廣州話的分道揚鑣，今日各豎旗幟，也是不爭的語言實況。但我們如何描述這其間的同異，分析種種變化的因由和規律？又或者說，我們應當如何具體說明香港粵語的特點，甚至能更明確地把過去兩百年發生的語言變遷作一個綜合性的交代？這些變化到底是如何發生？幾時發生？變化的牽涉面有多廣？變化的軌跡是否可循？這種種問題，都是研究語言發展歷史必須面對、尋求答案的重要切入點。尤有進者，這種種變化是否能在其他語言中找尋到類似的發展，發展的原動力和演變擴散軌跡是否也有相近之處？這種探討就牽涉到語言類型學方面的研究，其理論性的意義更超乎一時一地語言研究的討論。

要進行歷時研究，首要的重點不只是關心當下的語言實況，更具迫切性的是要搜集有關的歷時語料，從具體而且真實的語料中找尋頭緒，了解從前的語言實況。六十年代，我在研究香港粵語語法的時候，周先生替我把當時廣播電台的粵語連續劇錄成聲帶，前後共三十集。我每一集用拼音逐寫，按劇中演員說話的發音和用詞，如實記錄。因為這是口語演出，而且故事梗概以當時社會日常生活為主，所以這些錄音應該是最能反映六十年代香港一般老百姓說的粵語實況。我根據這些材料，整理分析，寫成論文，題目就是《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我六十年代末離開香港，生活環境改變很多，但是來往朋友很多都是來自香港，交談不離粵語；而且從香港的電影、電視中也可以觀察到粵語的新發展。但是我對這一些新的發展，只是從旁觀察，體會不深，可以描述，但不敢做進一步深入的探討。那些年我寫的有關粵語的文章，都是根據閱讀、觀察所得，對粵語某些語法、詞彙現象提出一些看法。例如，我寫了一篇有關粵語「將字句」的文章（1992），是我把大批香港雜誌的報導，逐句研讀分析。這些雜誌文章，有的是用語體文書寫，有的是文白交雜，用上許多粵語句子。我把語體文的句子翻成粵語，把粵語的句子翻成國語，兩相對比，這才發現許多粵語的「將字句」和國語的「把字句」，並不能直接對換。國語和粵語對這兩個看來十分相似的句型，其實各有一些不同的規限和要求。我1989年發表有關粵語量詞的用法，也是按同樣的方言對比而發現粵語的獨特之處。不過，這些研究主要都是根據我個人的語感而進行分析。當然，在分析同時，我也徵詢一些年輕粵語人的意見，印證我對問題的看法。

九十年代末，我有緣回到香港工作，日常教課，朋友來往，很多都是年輕一代的香港人。鄉音未改鬢毛催，我雖然是脾肉漸長，鬢毛轉衰，但是那「鄉音」已改的卻是這新一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們說的話和我熟悉的粵語雖然是大差不離，但是口音、腔調、用詞和造句都頗有明顯的差別。我說話的時候，他們往往會瞪著眼睛

望望我，顯然覺得我不屬於同一語族。他們說話，我也常常需要請他們重複一遍，放慢速度，我這才聽得比較明白。不過，這顯然不是我一個人聽覺或理解力的問題。一些和我年紀相彷彿、從海外歸來的朋友，也有類似的語言代溝問題。我於是趁這個難得的機緣，把這些所見所聞的新派粵語陸續記下，以供進一步的研究。

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三十年之間，語言確實發生許多大小變化。一直在香港本地生活的人也許並不怎麼覺得有什麼特別大的差異，見怪不怪，日久已成習慣。但是對一個「外來者」來說，這些變化會讓人覺得世紀末的香港粵語已經另成一格。我們試舉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例子來說明這現象。大家都知道時下年輕人說話會有所謂「懶音」的習慣。外來者會覺得是腔調失控，正音的學者會深以為詬。但是「懶音」所指到底是什麼問題？是哪些發音有乖尋常？香港人為什麼會發生「懶音」這樣的現象？是真的因為說話人嘴巴舌頭偷懶而造成發音怪異？「懶音」在社會上到底有多流行？正音教學大力糾正「懶音」，真的能挽救狂瀾嗎？再進一步追問，「懶音」的現象只發生在個別的字詞身上？哪些字詞？「懶音」只發生在個別說話者身上？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懶音」嗎？「懶音」的後果會是什麼？這些問題都值得有心人深思探討。我們試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些新發展的語言現象，我們可曾想過這些「懶音」可能正是表示語音正在轉化的過程中，整個語音系統已經逐步改變，經歷一個重整更新的程序？我根據自己幾年的觀察，細加分析，對比新舊發音，歸納出一些看法，寫成論文，題目就叫〈21世紀的香港粵語：一個新語音系統的形成〉(2002)。我的看法是香港粵語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已經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我們雖然剛步入一個新世紀不久，但是新舊兩代的語言，正經歷一個劃時代的大變遷。這些變化，並不來自一日，或源自一人。許多小變化在二十世紀就已經發生，開始的時候，小變化看似無關重要，但日久月累，小變化延伸越廣，影響越大，整個語音系統發生結構性的重整，聲、韻、調三個層面都顯示朝著簡

化的趨向發展。這種變化啟動以後，難以回轉，二十一世紀往後的幾十年，還會有進一步的變化嗎？我們只要小心觀察和記錄，也許可以看到整個粵語發展的大方向，從個別樹木而看到整個森林，視野擴大，所見所及，定必會有更大的啟發。

我們很幸運生逢在這語音系統轉型的時代，可以親耳聽到新舊兩代粵語發音的異同。我們可以再追問，老舊一代的發音到底可以上推到哪一個年代？我以前做過二十世紀中期的語音描述，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標準粵語音系。這套描述是否也適用於二十世紀早期？從二十世紀早期到二十世紀中期，其間的語音是否也在歲月轉移之中暗中偷換？說話人也許並不會有意識地感覺到自己的語言在變。有的時候，只有在明顯指出其間確實的差別時，寒燈一笑，金丹換骨，才會恍然大悟，才會覺得語言本身就像一個有機體，變化是語言原有的本性和機能。其實更具挑戰性的思考是在描述當今的語言同時，我們是否可以再努力上推幾十或一百年，繼續探索十九世紀或更早的語言會是怎麼一番現象？

我研究二十世紀中期的粵語，有六十年代的錄音作基本材料，我也可以把自己當作研究調查的對象——雖然我的母語不是粵語，但我相信我對粵語的語感還有一定的把握。我們研究二十一世紀的粵語，可以向新時代的年輕人請教，向周遭的媒體廣播取經。我回到香港工作，最大的收穫就是找到好些志同道合的老師同學，大家一起研究，一起切磋。有什麼問題，大家一起服其勞，尋求解決的方案。但是再往上推，二十世紀早期或者更早的語言，我們當如何切入，如何著手研究？我研究中古漢語，以敦煌文獻為本，變文講經文，頗有口語記錄，對研究歷時語法，提供不少可追尋的蛛絲馬跡。宋元以降，小說、戲曲、語錄等都是研究口語最好的原始資料。但是研究方言，卻沒有這種方便。中國文學傳統，向來是語文分家。除了北方官話以外，地方語言很少進入文本書寫。要研究方言歷時的演變，怎麼找合適的資料便成了最大的挑戰。

九十年代我在圖書館無意翻索，正是眾裏尋他千百度，燈火底下，書架上擺著的那一本老書，竟是一本十九世紀編寫有關粵語教學的教科書。口語對話，拼音書寫，中英對照，上一個世紀的活語言記錄在案。有羅馬注音，也就知道當時的發音；有中英對照，就可以研究當時的語法和詞彙。這一發現，新天地在望，心底感到的興奮，難以形容。隨後幾年，我的工作便集中在蒐尋語料，趁寒暑假遍訪各地圖書館。當中也得到了許多老師同學的幫忙，提供線索。結果從最早1815年到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出版，前後共找到二三十種材料，上下概括一百多年的老粵語語料。這些材料包括早期傳教士來華工作、為學習粵語而編寫的教科書和詞典，為傳揚福音而編寫的聖經翻譯和福音故事；也有一些是本地人為外省人士而編寫的粵語教材，還有一些是用粵語書寫的粵謳唱詞。有了資料在手，進行研究的時候，一字一推敲，再對比我熟悉的粵語，心裏感到踏實，分析也就言之有據。

當然不同的種類的記錄文獻有不同的重點，也有不同的描述。語音系統並不完全一致，語法詞彙也各有差別。這些差異可能是記錄錯漏的結果，也可能是反映不同時代的語言改變。我記得剛開始檢查早期語料的時候，發現有的記音用詞，和今日我們熟悉的語言很不一樣。我第一反應就是記音人耳朵欠靈敏，記錄出紕漏。例如表示遠指的指示代詞「嗰」，聲調標作陰去，和我們今天讀陰上差別很大。我想這一定是標調的錯誤。後來檢查更多的材料，發現遠指讀陰去確實是早期的正確發音，讀陰上是後起的變化。所以錯的其實是我的武斷和無知，而不是書上的記錄。又如粵語表動作完成的語法標誌是「咗」，早期語料中用「曉」或「咻」，發音是hiu，聲調是陰平。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句子，心底發毛，這是什麼怪字？「吃完飯」說成「食hiu飯」，乍聽之下，還以為是一句粗話。殊不知，「曉」是當時極流行的用詞，到了二十世紀以後，才漸漸讓「咗」取代。這種演變和替代都有一定的歷時階段或層次，要是沒有真實的語料

作證，我們很難猜測，更遑論推理構擬。這些早期語料意義重大，對我個人的研究影響極深。我把其中的一部分語料輸入計算機，建立數據庫——《早期粵語口語文獻資料庫》(<http://database.shss.ust.hk/Candbase/>)，公諸同好，以便檢索。近年學界也陸續在這一方面努力開發更多的電子檢索數據，收錄更多有關十九、二十世紀的語料。新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這方面的探索也越發會有更多的新發現。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只要假以時日，舊日粵語的面貌定可以在計算機上重新展現。

當今粵語語料中最早而且比較全面的老書，當數1828年出版的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中文書名是《廣東省土話字彙》，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編撰。其實馬禮遜在1815年出版的一本有關漢語語音的專書中，已經包括三百多字的粵音字彙。所以從時代前後來看，語料的時間上限大體可以定在十九世紀早期，距今二百年。這些早年的語料，大多出自香港、澳門等地編寫，所以研究香港粵語的歷史演變，這些語料提供的訊息十分珍貴。歷史的洪流，前浪後浪，二百年其實只是一個很短暫的時段。不過就這個小視窗所見，我們還是能看到十九世紀粵語的一些獨特現象。這些現象和後來粵語的發展大異其趣，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語言特點。也正因為其不同，我們可以把這些特徵視作我們鑒定十九世紀粵語的代表性標誌。

這些具有特徵性的標誌，當然包括語音、語法、詞彙各個層面。我們試簡單地舉一些例子說明一下。在語音層面，十九世紀的聲韻系統比較複雜。二十世紀的粵語，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標準粵語，聲母20，韻母51，聲調9。往上推到十九世紀，基本框架似乎一樣，但是聲母卻多了三個，也就是所謂的舌尖齒音，例如「四」讀成sz、「子」讀作tsz、「似」讀作ts'z。所謂西關口音，就保存這樣的舌尖齒音。韻母有增也有減，今日讀ei韻母的字如「你」(nei)、

「飛」(fei)等，十九世紀讀單元音ni、fi；從語料所示來看，一個單元音i分裂為複元音ei，那應該是二十世紀以後的發展。另一個韻母特點是「甘」、「暗」等字的韻母今日讀am，早期讀om。「甘」、「今」今音無別，但是十九世紀，「甘」的韻母是om，「今」的韻母是am，分別儼然。今日紅磡地名英譯，「磡」譯hom，就是保留十九世紀的讀音。又如「奄列」一詞是借自英文的omelette，「奄」今讀am，並不配合英文om-的發音，而早期粵語「奄」正是om。聲調方面，基本上是平上去入陰陽共九調。今日流行的變調，包括高平和高升兩類，十九世紀已經開始流行，不過當年涉及的字比較少，而且個別字詞的變化，有的是古不變今變(例如魚生的「生」，舊讀是高降原調，二十世紀是高平變調)，有的是古變今不變(例如菠蘿的「蘿」，今日保留原調，十九世紀讀高升變調)；更有意思的是陰平原調是高降調，變調是高平。但今日粵語，高降的發音已漸漸從語言中消失，陰平一般都讀作高平。例如「梳」字，二十世紀中期的發音有兩種可能：讀高降調是動詞，讀高平變調是名詞，所以「用梳梳頭」一句兩個「梳」字，聲調不同，以調辨義，但是今日都讀高平。不過廣州一帶，陰平卻大都保留高降的讀法。換言之，陰平讀高平調應該是二十世紀晚期以後香港粵語的特點。

在語法層面，上面提到的「嘍」表完成式，是十九世紀的特點，二十世紀而後完全消失。趨向動詞「嚟、去」可以直接放在「你、我」等代名詞或名詞之前，如「擰條頸巾嚟我」、「寫信去佢」，這種句式只見於十九世紀的文本，今日粵語一定要說成「擰嚟俾我」、「去佢處」才合語法。又如問句有所謂正反問式，例如：「你食唔食飯？」，十九世紀一律作「你食飯唔食？」，前後詞序不一樣。這一個變化，並不太難理解。正反問句式是把動詞的正和反並列，答案就在正反之間做一個選擇。一個像「食飯」這樣動賓組合進入正反問句，可以是「食飯唔食飯？」，但語言求簡略，一般都把其中一個賓語省略。

早期粵語省略後面的賓語：「食飯唔食飯」→「食飯唔食？」，二十世紀之後，一般卻省略前面的賓語：「食飯唔食飯」→「食唔食飯？」。省前還是省後，也就成了新舊粵語劃分的一大依據。當然，今日偶爾還會聽到年長的人說「食飯唔食？」，但是十九世紀的語料中卻沒有賓語後置的例句。

至於詞彙方面，例子不勝枚數。例如疑問代詞「邊個」，早期文本中可以作「乜誰」或「邊誰」；「颶風」，早年作「風颶」，發音是 fungkau；麵包可以說「面龜」（今日澳門粵語還保留「面龜」一詞）。加強描寫程度的副詞有「實首」，例如「實首好相與」，還可以說「交關」，例如「交關靚」（今日偶爾還可以聽到「靚得好交關」這樣的句子）。描述身體的感受可以用動詞「見」，例如「我見有啲頭痛」；表示趨向的動詞如「翻去」可以說「翻歸」、「去歸」。表示否定的「咪」或「唔好」，早期用「莫個」，例如「莫個開大價」，是「別亂開價」的意思；今日「唔好」也可以連讀合成一個音節 mou，如「mou 亂開價」。這種種語法和詞彙上的差別，語料中不乏類似的例子，但翻閱一不細心，很容易就忽略過去。要是我們在故紙堆中找到一沓子舊文件，乍看是粵語，但是稍微細讀，發現字裏行間有這一類型的用詞造句或拼音，我們可以推測大概都是十九世紀的文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舉過這樣的例子。假如今天要拍一部有關黃飛鴻當年在廣州活動的電影，就得先在語言上做一番考證。下面這兩句說話，哪一句會是十九世紀的黃飛鴻說的粵語？哪一句是二十世紀的演員會說的香港粵語？

- (1) 你莫個食曉飯之後咁 (kom) 遲正去尋個個朋友。
- (2) 你咪食咗飯之後咁 (kam) 遲至去搵個個朋友。

時間倒流，衣服道具或許可以唬人一陣，不過語言真假新舊，真人一張口，便知有沒有。

二十世紀的粵語承十九世紀的粵語而來，但兩個世紀的語言各有其語言特點，對比語料，不難分辨。那麼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粵語是否也可以根據某些語言現象來這樣區分嗎？上文已經說過二十一世紀的語音系統變化很大，詞彙方面，新世紀、新文物、新文化，詞彙不斷更新，自是當然之事。例如今日已漸漸流行的「電梯」(lift)一詞，我們當年說「升降機」，或英文借詞“lip”(今寫作「粒」)，「電梯」只是書面用詞。「教堂」的「堂」，我們當年讀陽平，今天讀高升變調。表時間用「一個字」表示「五分鐘」、「一個骨」表示「十五分鐘」這些說法，都隨著時代漸漸消失。我記得有一次我說「十點一個骨」(十時一刻)，年輕人問我這是什麼意思？我解釋說「骨」就是英文 a quarter 的意思。他接著再追問，「十點半」是不是可以說成「十點兩個骨」？年輕人舉一反三，聯想很快，但是粵語並沒有這樣的說法。「骨」是外來語，當年有許多外來語，今天都已經不用。例如「士擔」、「士的」等，今天都讓「郵票」、「拐杖」這些書面詞語取替。至於語法方面，我們以形容詞重疊的句型為例。粵語可以利用形容詞重疊的手段以表示程度高低不同。以「肥」為例，表示略微如此，則說成「肥肥咗」，是「有點胖」的意思，第二個「肥」要讀高升變調；但是要表示加強「肥胖」的意思，可以說成「肥肥」，第一個「肥」讀高升變調，意思是「非常胖」。這兩種表示程度差別的說法在二十世紀中期十分普遍，但是我九十年代來香港工作，發現語言中只留下「肥肥咗」的用法，而「肥肥」的說法，年輕人都說沒聽過。短短的二三十年，一個曾經十分常用的句型，居然消失於無形。要不是我親眼看見年輕人滿臉疑惑的問我「肥肥」什麼意思，我簡直不能相信。二十一世紀進入二十年代，我們可以深信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普通話越趨流行，粵語會有更大的轉變。這種社會語言的變遷，廣州的粵語是最好的例子。廣州民間雖然還是廣府話的天下，但官方語言、教學語言、普通話定於一尊。一般年輕人交談，雖然都是廣州口音，但語法用詞常常夾雜北方特色，另成一體。

我幾十年來在粵語裏打轉，從學說廣東話，到研究廣東話，從描述我熟悉的二十世紀的粵語，到利用早期語料探索一百多年前的粵語，前後寫過好些文章。除了在1972年《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2007年增訂版)曾對六十年代的粵語作比較詳盡的描述外，我在不同的文章中也對個別語音、語法、詞彙的現象進行進一步的探討，尤其是歷時文獻讓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切入，研究許多前人沒有注意到的現象，提出一些我個人對整個粵語在發展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變化，略加說明和注釋。上文提及的各種語言現象，我大都曾在各文章中有比較詳細的描述和分析。各篇文章選材不同，年代不一，觀察自有其局限性。愚見不深，討論一定有所偏頗舛漏。但我還是覺得應該把所觀察到的現象、所作的各種分析，歸攏成集，供有心人參考。

書中各章探討的現象，有的涉及語言本身的變化，有的涉及社會語言中各種豐富多姿的現象。從描述的角度來說，我的觀察或許略有可取的地方。但是我自己最關心的一點，也是我自己覺得還沒能做到足夠的地方，就是在眾多的語言現象中，怎麼尋找演變背後更大的大規則。我試著按材料展現的各種變化，抽絲剝繭，在描述之餘，嘗試解釋個別演變的軌跡，和這些演變對我們今後的研究有什麼啟示。根據語料顯示，我們可以暫且明白某一個現象演變的來龍去脈，但是我們還沒有怎麼強有力地說明這些變化為什麼會在某一個時間點發生。從歷時探討中，我們發現許多十九世紀的語言現象都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變化。但是為什麼會在這個特別的時段發生？是因為社會的轉型、外來的方言和語言對本地粵語產生的一定影響？還是語言內部因為某一種變化而接著產生的連鎖反應？這種種可能性，我們必須仔細探討分析，希望能一步一步把語言演進的步驟、軌跡、原因和時間逐步還原，得到一個更全面的認識。我所知有限，識力有限，文章中的論說和推測，不足之處，還請有以諒我。

我歷年所寫的單篇文章，有中文稿、也有英文稿，現在合為文集，分中英兩冊。中文一冊書名是《香港粵語：二百年滄桑探索》，英文一冊現名為 *Cantonese: Since the 19th Century*，共收文章二十餘篇。最早的一篇是1982年有關粵語歇後語的文章(英文)，最近的一篇是2018年討論粵語方言詞「嚟」自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中的變化(中文)。每冊按語音、語法、詞彙分類，從共時描述、到歷時探討，我都以材料先行，再進行分析。

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前後四十年，從讀書到教書，一直隨業師張琨先生學習。張先生除了在研究上開啟我對歷時語法的興趣，更重要的是他在研究方法上對我再三的叮囑。他曾經說過，語言研究，理論日新，但要是沒有充足和充實的材料作基本依據，再動聽的理論也只是七寶樓台而已。這是他一生做學問的原則，也成為我幾十年來做研究的圭臬。蒐集材料其實是再興奮不過的工作，不管是實地的田野調查，還是圖書文獻檢索，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簡單如一個詞語或者一個聲音的轉移，複雜的像整個內部系統的調整，或者在和其他語言對比下發現類型上的互動或轉型，都是在不斷推動我們向前更進一步的原動力。我曾經在美國大學教初級漢語，學生所犯的錯誤往往讓我追問這些錯誤到底是因為他們學習不勤，還是老師講解不詳，還是我們自己對這個語言了解不深。我常常從學生的錯誤中而發現漢語語法中一些特別的規則和變化，一直是說母語的人不曾或不會察覺到的現象。我也曾經就這些觀察，做過一些研究，1994年出版 *A Practical Chinese Grammar*。我在國語和粵語之間、在現代粵語和早期粵語之間來回周旋，總覺得我們越研究、越發現自己所知極為有限。有時以為已經往前踏進一大步，結果又回到原點，從頭再來。學海無涯，古有明訓。但無涯之中，自己也漸漸學到如何靠自己的努力在學海中上下浮沉。有興奮的一刻，但更多的時候是懊惱和失望。不屈不撓，學海明燈就是我們對自己的信心和期望。

這次成書，首先得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首肯，答應出版。今中文一冊《香港粵語：二百年滄桑探索》付梓，承蒙社長甘琦先生、編輯葉敏磊先生大力支持，並代向發表文章原來的學報徵求轉載的許可，銘感至深。中文編輯部分，得到彭佩玲小姐謄寫校對，費時費心，十分感謝。出版事宜細節，由出版社編輯余敏聰先生全力統籌，文章格式、文字訂正無不逐一細心檢查，又設計及排版由黃俊欣小姐負責，在此謹致衷心謝忱。書中各文章原載學報，都在文末清楚說明。因為版式，各篇文章皆稍有增改，文中原有沙石亦略作修訂。研究早期粵語的各篇文章，因為徵引語料不盡相同，請參考每篇文章所附的參考書目。前後撰寫的文章課題不一，各自成文，但內容相關的地方，論述徵引或有重複，請諒。全書所用的粵語拼音，亦按每篇原文，不作改動。

我在柏克萊大學工作二十六年，在香港科技大學工作六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六年，幾十年的教學生涯，讓我有機會向同行學者老師請教指點，向不同年代的年輕同學朋友學習。我謹在此衷心感謝他們的無私鼓勵和支持。最後，我願意把此書獻給我的另一半李曉茵。她是我最好的語言老師和粵語調查人。她在廣州出生，在香港長大，我們同是一個年代的香港人，但是她對粵語的掌握遠勝於我。四十年來，燈前月下，我每每向她追問同樣的問題：粵語可以這麼說嗎？她的答覆也就成為我研究粵語最原始的第一手資料。

張洪年

2020年

加州小山城觀海居